

刘焕阳 主编

春华秋实

集萃
[下]

Chunhua Qiushi
Jicui



山东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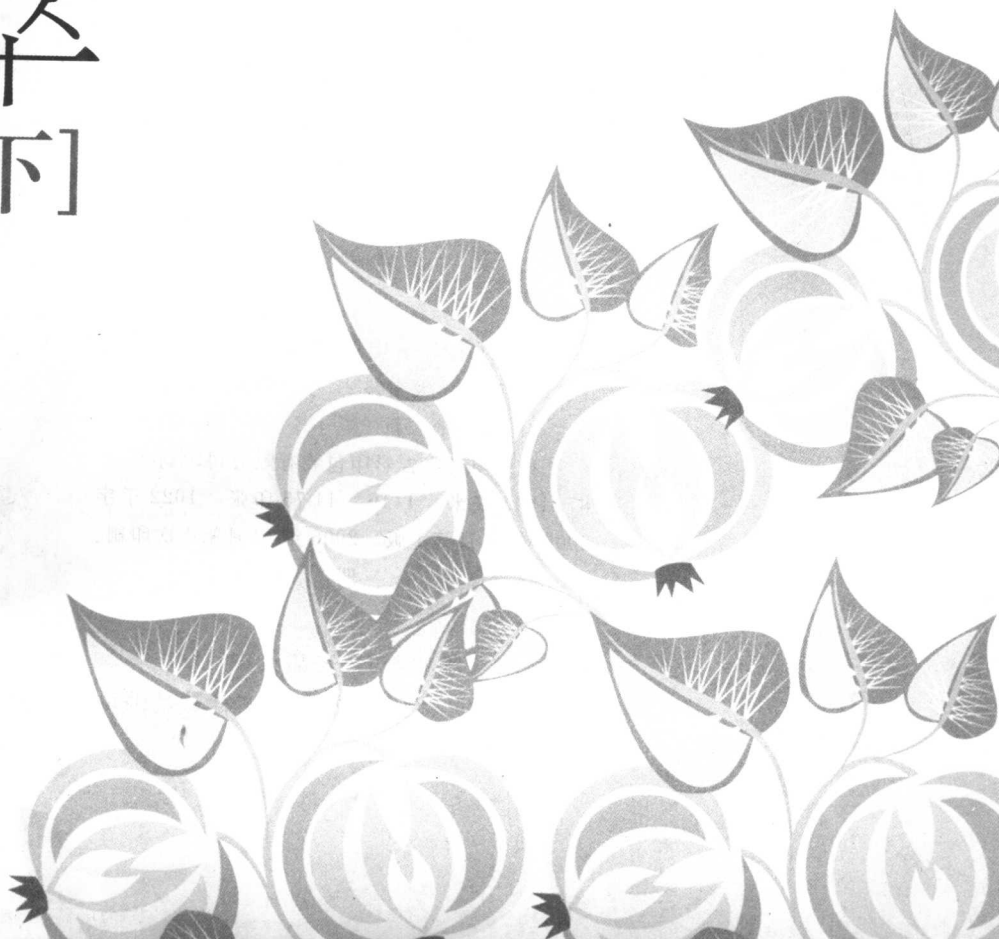
春华秋实

主 编 刘焕阳
副主编 冷志强

集萃
Chunhua Qiushi
Jicui
[下]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华秋实集萃/刘焕阳,孙虎山主编.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2
ISBN 7-5607-3311-5

- I. 春...
- II. ①刘...②孙...
- III. 高等学校—毕业论文—汇编—烟台市
- IV. G64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3009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阳光广告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44.75 印张 1022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全三册):7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 言

毕业论文(设计)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实际问题、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实践过程,是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检验高校人才质量的重要手段。我校在由师范院校向综合大学转型的过程中,办学理念及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对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加强了毕业论文(设计)所依托的软、硬件建设,注重在常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加强了实践教学,建设和完善了校内外实习基地和各类实验室,为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条件;通过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等多种途径建立起一只与综合性大学相适应的师资队伍,促进学生选题与教师的科研结合、与实验室建设结合,以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保障论文(设计)质量。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也是教学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制定了多项措施,加强了对选题、指导及答辩等程序的过程管理,建立了监督、评估体系和较为健全的奖惩机制。为了在更大范围内鼓励和表彰在我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指导教师和学生,为了向全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展示我校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的优秀成果,我校决定从2004届毕业生开始,从历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遴选出部分优秀论文(设计)汇编成《春华秋实集萃》一书,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依据学校的答辩程序和答辩纪律,各学院的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经过了双重评定,即第一次答辩时成绩评定须为优秀,在学院答辩委员会组织的“申优答辩”中成绩评定仍须为优秀。所以各学院的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已属于我校论文(设计)中的上乘之作。本书所录之论文(设计)又是学校按照《鲁东大学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评选办法》的有关规定,从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以“科学、公平、公正、公开、宁缺毋滥”的原则一一筛选出来的。这些论文(设计)作品经过层层评定,优中选优,堪称我校历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的精品。

本书的编印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各学院领导、教师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指导老师在百忙之中对指导的论文(设计)进行了细致的审校。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谬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尔雅注》中的双音词研究.....	晁瑞莲(1)
梁启超与清代学术研究	韩中专(10)
走进苏霍姆林斯基的阅读世界	郑丽娜(18)
寻找的心灵轨迹——论莫言的梦境写作	张习涛(24)
也谈“程度副词+名词”	张 华(32)
汉英穿戴语义场对比研究	张琼琼(41)
倔强的反抗姿态——阿尔贝·加缪的反抗世界	孔 雪(49)
韩非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之比较	郑培国(57)
面对 WTO 带来的挑战中国企业的品牌营销战略	李晓萍(63)
我国民办教育的产权分析	王慧杰(69)
论制定《民法典》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关注法典化的软环境问题	秦玉罕(76)
从农民到公民——农民平等权的宪政分析	赵中华(83)
十六国北朝时期河东薛氏研究.....	王金强(101)
内战前夕美国南方地区主义溯源.....	张 磊(108)
魏源的社会变革与爱国主义思想.....	王静静(125)
浅析爱伦·坡文学理论中“美”的概念.....	冯 照(131)
Teaching Grammar in Middle School	董 青(141)
On Chinese and English Psychological Culture Differences	孙悦欣(152)
省略表现と日本文化について——浅谈省略表达和日本文化的内在关系	张 扬(161)
我国高等教育制度转型及其对策研究.....	于文兴(170)
关于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实施的探讨.....	郭 蕾(178)
初探音乐教育多元化与综合性背景下音乐教师的人文素质.....	王 隽(184)
莫扎特《a 小调回旋曲》音乐分析	刘 楠(190)
浅析广告设计的文化内涵.....	杨海霞(211)
浅谈版画中的抽象性.....	曹 旭(219)
美术教学中对学生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的培养.....	孙海萍(223)
流行美与广告设计.....	王丽娜(227)

《尔雅注》中的双音词研究

汉语言文学学院 晁瑞莲

绪 论

《尔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综合分类词典,其成书年代现在公认是战国晚期,其中所收录和解释的词,既有语文性词汇,也有百科性词汇,代表了我国上古汉语词汇的概貌,它也是我们认识上古汉语的桥梁,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早在汉代,《尔雅》就有了许多注本。但是,这些注本多不尽如人意:“虽著者十馀,然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1](P2)}晋郭璞作《尔雅注》,吸收了前人的注释成果,同时也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因而成为当时注《尔雅》的权威性著作。所谓注释,无不是以今释古、以易释难、以普释方。郭璞为东晋人,他的注释用的是东晋时期的语言。魏晋是中古汉语乃至近现代汉语的发端时期,是汉语由单音节语向双音节语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通过郭璞的注释用词汇来了解东晋时期的语言面貌,通过比较《尔雅》中的词语和与之对应的郭注中的词语的关系,对于了解汉语词汇双音化的演变轨迹,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以《尔雅注》为语料,穷尽性地搜集了郭璞注释中与《尔雅》中单音节词所对释的双音节词,然后对这些双音词进行结构分析,并与所对释的单音词进行比较,从而探讨汉语词汇双音化的方式和途径,总结其演变的规律。

一、郭璞解释的对象

《尔雅》是用周秦时期语言解释更早的上古时期的汉语词汇。《尔雅》中的被解释词连同解释语,到了晋代都成了当时人的“古代汉语”,成了被解释的对象。因此,郭璞所解释的对象,既有《尔雅》中的被解释词,也有解释词。

郭璞注中的双音词,有的是解释《尔雅》中被释词中的单音词的,例如:

胎——胚胎。《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郭注:“胚胎未成,亦物之始也。”以“胚胎”释《尔雅》中作为被释词的“胎”。类似的还有:

谋——谋虑。《释言》:“谋,心也。”郭注:“谋虑以心。”

犯——陵犯,奢——夸奢,果、毅——果毅。《释诂》:“犯、奢、果、毅、剋、捷、功、肩、堪,胜也。”郭注:“陵犯、夸奢、果毅皆得胜也。”

由于《尔雅》中的解释语在晋代也已经成为“古代汉语”,因此,《尔雅注》中的双音词有

的是郭璞以双音词解释《尔雅》中的解释词。这类情况比较多,约占双音词总数的54%。例如:

狎——习狎。《释言》:“甲,狎也。”郭注:“谓习狎。”

恭——恭敬。《释训》:“肃肃、翼翼,恭也。”郭注:“皆恭敬。”

恶——憎恶。《释训》:“居居、究究,恶也。”郭注:“皆相憎恶。”

还有的时候,郭璞把《尔雅》中的被释词和解释词一并用双音词解释。这种情况约占35%。例如:

仍——频仍,埤——埤益,胝——胝脯,厚——重厚。《释诂》:“惇、亶、枯、笃、擎、仍、胝、竺、腹,厚也。”郭注:“频仍、皮衣、皮肤,皆重厚。”

探——刺探,试——尝试。《释言》:“探,试也。”郭注:“刺探,尝试。”

冥——冥昧,幼——幼稚。《释言》:“冥,幼也。”郭注:“幼稚者,冥昧。”

蠢——蠢动,逊——谦逊。《释训》:“蠢,不逊也。”郭注:“蠢动为恶,不前勋业。”

上述两项加起来,占郭璞所有解释的89%,而对《尔雅》中的被解释词所作的解释仅占11%。这说明,《尔雅》中的解释语是郭璞注释的主要对象。郭璞之所以把《尔雅》中的解释语作为解释的主要对象,是因为《尔雅》中的解释语是沟通古今词汇的桥梁。郭璞用晋代的词汇去对译这些词,是在进行二度或三度沟通的工作,即沟通晋代汉语和上古汉语的关系。

对郭璞注释语中的双音词,我们作了全面的搜集。

二、双音词与双音词组的区分

在搜集郭注中的双音节词时,首先遇到双音词与双音词组的区别问题。二者如何区分,历来是个“老大难”问题。王力先生曾说过:“必须承认,词和伪语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2](P241)}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情况下,二者还是能够进行区分的。我们借鉴王力先生区分词和伪语的标准,在区分词与词组时注意了以下三点:

第一,确定标准要从汉语的特点出发。汉语属于孤立语的类型,缺乏形态变化,主要语法特征是虚词和词序等。我们在确定双音词的标准时,既重视语法结构,也不忽视词的语义结构。

第二,规定标准要从多方面着眼。吕叔湘先生说得对,由于汉语缺少发达的形态,往往难以根据单一标准作出一个决定,常常要综合几方面的标准。具体到认定一个双音节词,就要从语法形式、词汇意义、修辞手法以至使用频率等多方面进行考虑。

第三,运用标准要注意一致性。各标准之间的关系虽然有主有从,但它们却是彼此参证、相互补充的。因此,运用标准要保持前后一致,不能自相矛盾。

根据以上理论,我们在区别《尔雅注》中的双音词与双音词组时,主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根据内部结构进行区分

一个双音组合,可通过其内部的语义结构来判定它是词还是词组。根据这个标准,首先可以把单纯双音词区分出来。

1. 双音单纯词的区分

单语素的双音结构就一定是双音词而非词组。例如联绵词和有词尾参与构词的附加

式双音词。

(1)联绵词。对其结构进行静态分析,它是只有一个语素的双音结构。例如:

《释言》:“窈,间也。”郭注:“窈窕,间隙。”郭璞以“窈窕”释“窈”。“窈窕”只有一个语素,两个音节不能拆开释义,是联绵词。

《尔雅注》中一些无理据的双音名物词,我们一般把它们看成是联绵词。例如“鸬鹚”、“喉咙”、“豺狸”等。这些词由两个音节共同记录一个概念,当然是双音词。

(2)附加式双音词。即单音实词加词尾构成的双音结构。上古汉语中有一些词尾,如“而”、“尔”、“然”、“焉”等,它们附着在某些实词之后,构成双音词。这些有词尾参构的双音词往往是具有描写作用的形容词或副词。如“莞尔”、“铿尔”、“杳然”、“潜焉(出涕)”。郭璞注《尔雅》也用了许多类似的双音词。例如:

《释言》:“黯,黠也。”郭注:“黯然冥貌。”郭璞用“黯然”释“黯”,“黯”与词尾“然”结合,构成双音词。

郭璞注中的词尾主要是后缀“然”、“尔”、“子”和前缀“阿”。例如“忽然、蓦然、蛞然、偶尔、刘子、阿阳”等。

2. 双音复合词的区分

区分双音词和双音词组,主要涉及的是双音合成词。把双音合成词从词组中区分出来,我们主要运用插入法。一个双音组合,在中间或前后加上别的词语(主要是虚词),意义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词,反之是词组。例如:

《释言》:“茹、虞,度也。”郭注:“皆测度也。”“测度”如果改为“测与度”便失去原义“推测、揣度”。因此,可以认定,“测度”是词。而下列两条,则是以双音词组来训释单音词的:

定——静定。《释诂》:“貉、嗅、安,定也。”郭注:“皆静定。”

返——回返。《释言》:“还、复,返也。”郭注:“皆回返也。”

“静定”、“回返”都能够插入虚词,二音节结合松散,因此应该是词组。

(二)根据词义进行区分

指从词汇意义上对双音结构进行区别。语言的结构同它所表达的意义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当我们从结构上分析一个双音组合能不能拆开、扩展,归根结底是以逻辑事理为基础,受词语意义所制约的,因此语言单位所表达的意义也是判定词和词组的标准。

从意义上区别词和词组,就是看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双音组合是共同代表一个概念还是每个音节各代表一个概念。如果两个音节共同代表一个概念,说明这个组合是紧密的、不可分割的,一般是词;两个音节各代表一个概念,说明这个组合是松散的,是可以拆开的,一般是词组。例如:

《释言》:“柢,本也。”郭注:“谓根本。”

《说文解字》:“根,木株也”^{[3](P118)}，“本,木下曰本”^{[3](P114)}。“根”“本”合用,表示事物的根源或最重要的部分。二者由两个代表不同概念的单音词合成为共同代表一个新概念的双音词。

《释言》:“陨、云、湮、虾、降、坠、零,落也。”郭注:“湮,沉落也。”

物体在水中由上而下曰“沉”,“落”通指一切下落事物的状态,二者组成“沉落”,从特定的角度表达了落的意义,形成一个交际能力更强的近义双音词。这是由一个专指的概

念加一个通指的概念合成的双音词。

《释诂》：“迁、运，徙也。”郭注：“今江东通言迁徙。”

《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解释二者为：“迁，迁移”；“徙，迁移”。二者同义。

此外，根据后来出现的频率也可以作为判定双音词和词组的条件。有些组合在后代文献中仍然出现，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双音词；而有些组合后来出现很少，例如“静定、回返”，我们就认定是临时的组合，因此把它们认定为双音词。

根据以上标准，我们从《尔雅注》中，一共统计出了 511 个作为相应单音词释语的双音节词(不包括重复出现的)，我们对这些词的结构进行分析，根据两个语素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了以下四种结构类型。

三、《尔雅注》中双音词结构分析

(一)单纯双音词

1. 联绵词

《尔雅注》中出现的联绵词一共有 26 个，如“窈窕”、“陂陀”和失去理据的双音名物词如“狢狸”、“鹈鹕”。它们属于单纯双音词，两个音节不能拆分为两个词素。

2. 附加式双音词

由一个表示具体词汇意义的词素和一个表示某种附加意义的词缀构成。《尔雅注》中一共出现了 15 个附加式双音词。主要的词缀有后缀“然”、“子”和前缀“阿”。

有后缀“然”构成的词多是副词。例如：

忽——忽然。《释诂》：“確，悉、卒、泯、忽……殄，尽也。”郭注：“忽然，尽貌。”

怒——怒然。《释言》：“怒，饥也。”郭注：“怒然饥意。”《诗经·周南》：“未见君子，怒如调饥。”“怒如”即“怒然”。

有后缀“子”参构的词多是名词。例如：

柎——柎子。《释木》：“柎，櫨。”郭注：“关西呼柎子。”

刘——刘子。《释木》：“刘，刘杙。”郭注：“刘子生山中，实如梨。”

有前缀“阿”参构的词多是名词。例如：

阿——阿阳。《释诂》：“台、朕、賁、界、卜、阳，予也。”郭注：“今巴濮人自呼为阿阳。”

此外，词尾还有一个“尔”，如“偶尔”。

(二)双音复合词

郭璞《尔雅注》中，用双音复合词解释单音词的占绝大多数。这些词是我们考察汉语单音词双音化规律和途径的重要资料。我们对这些双音复合词进行了结构分析，以此来探索汉语单音词双音化的原因和途径。通过分析，郭注中的双音复合词共有并列式、偏正式、主谓式三种结构形式，其中以并列式复合词为绝大多数。

1. 并列式复合词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这样定义“并列式复合词”，即由两个意义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词素并列组合而成的词语。

在郭注 511 个双音复合词中，有 325 个并列式结构的双音词，占双音词总数的

63.6%。这些双音词的出现,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郭璞往往找一个与《尔雅》单音词意义相同或相近、相关、相类的词构成双音词,构成对《尔雅》中单音词的注释语。例如:

导——教导。《释诂》:“诏、亮、左、右、相,导也。”郭注:“皆谓教导之。”以“教导”释“导”,教、导同义。

重——厚重。《释言》:“𡵓,重也。”郭注:“谓厚重。见《左传》。”

喜——欢喜。《释训》:“坎坎、𡵓𡵓,喜也。”郭注:“皆鼓舞欢喜。”

赐——赐与。《释诂》:“賚、贡、锡、畀、予、贶,赐也。”郭注:“皆赐与也。”

贫——贫陋。《释言》:“窶,贫也。”郭注:“谓贫陋。”

变——变易。《释训》:“谕,变也。”郭注:“谓变易。”

这种情况表明,《尔雅》中作为解释语的这些单音词,在晋代口语中已经有了相应的双音词。这些双音词,都是在原单音词的前后增加一个与之同义的语素构成并列式复合词。

第二种情况,是郭璞直接用一个与《尔雅》中的单音词同义的双音词做这个单音词的注释语。这个双音词,除了在词义上与被解释的单音词同义之外,在构成上与这个单音词没有关系。例如:

偷——苟且。《释言》:“逃,偷也。”郭注:“谓苟且。”

庶——众多。《释言》:“庶,侈也。”郭注:“庶者众多。”

障——壅障。《释言》:“长,𡵓也。”郭注:“谓壅障。”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用晋代口语中新产生的双音词直接对译《尔雅》中的单音词。这些双音词的构词成分与它所对译的单音词没有关系,是全新的。同第一种情况相比,这种新词是少数,郭璞所用的双音词,绝大多数是在原有单音词的基础上增加同义语素构成的。这也充分说明了古今汉语之间的延续性,这是汉语得天独厚的特点之一。我们现在之所以仍然能够读懂三四千年前的文献,汉语词汇在词义系统和词汇结构上具有延续性,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这些并列式复合词,其两个构词语素在意义上的关系还是有差异的。

(1)同义关系。两个语素在意义上是同义关系。例如上举的“教导”、“欢喜”、“沉重”等。

(2)同类关系。即两个语素的意义的类别相同,但其作为单音词时其词汇意义并不相同。这类词在郭注的对释中共出现了10个,例如:

“琢磨”、“镂刻”、“切磋”。《释器》:“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郭注:“六者皆治器之名。”

翔——翱翔。《释鸟》:“鸢鸟醜,其飞也翔。”郭注:“布翅翱翔。”

(3)反义对举关系。即由两个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语素组合而成的双音词。这一类比较少,在郭注中一共只出现了3个:“先后”、“容止”、“夭僂”。

“容止”。“容”,《说文·八部》:“容,盛也。”徐楷《系传》:“此但为容受字,容貌字古作颂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登部》:“假借为颂。”《说文·页部》:“颂,貌也。”“止”,《说文·止部》:“止,下基也。”《广韵·止韵》:“止,足也。”这个字后作“趾”。一个表示“貌”,一个用作“趾”,由此可见,“容止”是反义对举的并列双音节词。

2. 偏正式复合词

偏正式复合词,是指双音复合词中的两个语素,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语素具有修饰、限制的作用。这类偏正式复合词在郭注中一共出现了 108 个,占全部双音节词的 21.09%。两个语素之间的意义关系有以下几种:

(1)单音名词后加表示种属概念的词构成偏正式复合词。例如:

辇——辇车。《释训》:“徒御不惊,辇者也。”郭注:“步挽辇车。”

连——连草。《释草》:“连,异翹。”郭注:“一名连苕,又名连草。”

梨——梨树。《释木》:“梨,山檣。”郭注:“即今梨树。”

鲂——鲂鱼。《释鱼》:“鲂,𩚑。”郭注:“江东呼鲂鱼为𩚑。一名𩚑。”

这种偏正结构的双音节词,正语素表类,即逻辑上的上位概念;偏语素表属,即下位概念,如转换成词组,从意义上可扩展为“A 这类 B”。

(2)单音名词前加形容词构成偏正式复合词。例如:

鳅——泥鳅。《释鱼》:“鰕,鳅。”郭注:“今泥鳅。”

鹭——白鹭。《释鸟》:“鹭,春钜。”郭注:“白鹭也。”

鸱——巨鸱。《释畜》:“鸡三尺为鸱。”郭注:“阳沟巨鸱,古之名鸡。”

(3)单音名词成另外一个偏正结构的双音节词。例如:

髦——俊士。《释言》:“髦,选也。”郭注:“俊士之选。”

3. 述宾式复合词

在述宾式复合词中,前一语素表示动作、行为,后一语素表示动作行为所支配或关涉的对象。在郭注中,一共出现了 15 个述宾式的双音复合词。郭璞在《尔雅注》中,他主要是用述宾式复合词解释《尔雅》中的动词。例如:

陪——陪位。《释言》:“陪,朝也。”郭注:“陪位为朝。”

适——适意。《释言》:“展,适也。”郭注:“得自伸展皆适意。”

4. 补充式复合词

指在两个词素中,后一词素在意义上补充说明前一词素。郭注中的补充式复合词数量很少,仅出现了 10 个。从起补充说明的词素与中心词素在意义上的关系来看,主要是从结果上对动词词素进行补充。例如:

殄——殄绝。《释言》:“殄,绝也。”郭注:“为殄绝。”

契——契断。《释诂》:“契、灭、殄,绝也。”郭注:“今江东呼刻断物为契断。”

(三)结构分析总结

上述六种结构:连绵词、附加式双音词、并列式复合词、偏正式复合词、述宾式复合词和补充式复合词等,大体概括了郭注中的双音词的结构类型。从中可以看出,上古汉语中的许多单音节词,在晋代已经转化为双音节词,有些还正在处于演变的过程中。在我们所考察的 511 个双音节词中,并列式复合词占主导地位,偏正式复合词已经初具规模,但相对于并列结构,数量要少得多;述宾式、补充式、附加式结构的双音词数量更少,说明这些构词方式还只处于萌芽状态。

四、从《尔雅注》中的双音词看汉语双音化的原因

通过对《尔雅注》中的双音词结构和类型的分析,我们可由此总结出汉语词汇的双音化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词汇意义的增加导致了双音化

在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词的意义由单义化向多义化演变,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赋予一个单音词多个意义,单音节词通过引申、假借致使义位增多,词义负担过重,其结果必然导致词的复合化。例如:

《释言》:“庶,侈也。”郭注:“庶者,众多,为奢侈。庶,幸也,庶几侥幸。”

即,“庶”有两个常用义:①众多;②侥幸。为了区分,分别产生了两个双音词:“众多”、“庶几”。郭璞用这些双音词来分别对译“庶”的两个义项。

《释诂》:“烈、绩,业也。”郭注:“谓功业也。”以“功业”释“业”。又:“绩、勋,功也。”郭注:“谓功劳也。”以“功劳”释“功”。由此可见,“绩”已经产生了两个常用义:①功业;②功劳。因此,产生了两个相应的双音词。

双音词的产生抵消了由于词汇的多义化而可能产生的理解上的混淆。赵振铎先生说:“汉语的发展到了郭璞时代,多义的单音词已经不足以完成交际的任务,需要用一个复音词才能够使表达的意思更加明确。”^{[4](P112)}义位的增多必定影响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对词义理解的准确性,因此,郭璞在其注释中特别注意区分同义词,而这种区分主要是通过由被区分词所构成的双音词来进行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多义词义项区分的需要在汉语词汇双音化过程中的作用。例如:

《释诂》:“探、篡、俘,取也。”郭注:“篡者,夺取也;探者,摸取也。”

案,“篡”、“探”为同义词,中心义素是“取”,限定义素有重大差别——“篡”的方式是“夺”,“探”的方式是“摸”。构成的双音词,就解决了同义词之间的区分问题。

(二)汉语的语音特点导致了词汇的双音化

在郭璞所使用的双音词中,由两个词素并列组合而构成的双音词占了极大的比例,在511个双音词中,有325个并列式复合词,占63%强。可见,在汉语词汇双音化过程中,并列式双音复合词数量最多。语言在发展,这要遵循两个规律,一是区别率,二是简约率。所谓区别率,是指语言单位之间要有一定的区别度,以免造成理解上的误解和混淆。为了区别多义词的义项而产生的双音化现象,正是在区别率的推动下发生的。并列式复合词以外的双音词也是如此。所谓简约率,是指语言在表达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赘余现象,以使语言简洁、明确。

但是,并列式复合词既不是为了区别意义而产生的,也与区别率背道而驰。因为,一个单音节就能够表达意义,附加上一个意义完全相同的音节,既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也造成了语言表达上的不必要的冗余。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产生如此众多数量的并列式复合词呢?我们认为,汉语讲究节奏的语言特点,是汉语词汇双音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古时期的汉民族是一个注重音乐,音乐普及率非常高的民族,史传早在远古时期就有采乐之官,《论语》中出现的“夔一足矣”中的“夔”,相传就是皇帝的乐官。对音乐的重视和普及在周秦时期达到了高峰,因此才会有《诗经》出现。汉民族对音乐节奏的敏锐,不能

不体现在语言中。因此,从周秦时期的文献中便可发现,当时的汉语已经是一种讲究节奏、韵律的语言。《尚书》是一部散文体著作,可其中却有许多韵语。汉语这种讲究节奏和韵律的语音特点,体现在语言结构上,就是讲究词汇结构和句式结构的对称。近人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指出:“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等者,较单词只字,其词气稍觉浑厚。”^{[5](P30)}这种“词气”其实就是节奏感、韵律感。因此,当语言表达感觉到节奏不足的时候,人们就往往去补足一个音节,以满足这种节奏的要求。而为了表达的准确,不足的音节不可以影响表达的效果,即不能产生歧义,因而只有补足同义音节才能满足这一要求。由于人们对语言节奏的要求和讲究如此重视,以至于出现语义表达上的重复和赘余也在所不惜。传统小学中的“同义复用”现象,都是这样产生的。有时候这种“同义复用”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例如《史记·屈平贾谊列传》: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劳苦倦极”和“疾痛惨怛”都是四个音节的“同义复用”,在语义的表达上可谓浪费到极点,但是,如果除掉一个或两三个音节,仅仅凭我们的语感,这句话在节奏和韵律上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汉语双音词汇中存在着大量的并列式复合词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候,人们为了满足节奏的需要,不惜以牺牲意义表达上的准确性为代价。古代汉语中存在的数量不少的“偏义复词”就是这种节奏与表义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牺牲表义准确性的产物。例如《墨子》:“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人桃李。”无论是窃“桃”还是窃“李”,入“园”即可,不必入“圃”,因为“圃”中既无“桃”也无“李”。“桃李”连称,是为了补足音节;“园圃”连言,仍然是为了补足音节。如果不用“圃”,就破坏了这句话的节奏感,因此,影响句子意义准确表达也在所不惜了。

正是由于汉语追求节奏和韵律的语音特点,导致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发生。郭璞注语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并列式复合词,是当时汉语词汇面貌的真实反映。

在郭璞《尔雅注》中,除了大量的并列式复合词之外,现代汉语双音词中所有的结构形式如述宾式、补充式、偏正式、主谓式均已产生(主谓式只有两例,因此未单列一种,在表中以黑斜体的形式出现)。这说明,汉语词汇史上由单义化向双音化的转变,至郭璞所处的晋代基本完成。郭注中的词语已经与中古、近现代汉语非常接近,而与上古汉语出现了很大差异;从数量上已经从《尔雅》单音词占绝对优势发展到郭注中双音词占绝对优势;新的构词法已基本成型。其中,最成熟的构词方式是并列式、偏正式、述宾式、补充式、附加式和主谓式等构词方式初步形成或正在萌芽。郭注中运用大量并列双音节词训释《尔雅》,在构词方式上以上古基本词汇为核心,在原有单音词的基础上加上另外的语素构成,灵活多样,拓展了新词产生的途径,利于社会的交际。词义上,并列复合词融入了原有单音词的意义,克服一词多义的困难,极为出色地完成了沟通古今的使命。这也是郭璞《尔雅注》在汉语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原因,同时,也使郭璞注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引用文献

[1]郭璞.尔雅音图[M].北京:中国书店,1985

- [2]王力.词和仿语的界限[A].王力.王力文集·十六[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赵振铎.尔雅和尔雅诂林[J].古汉语研究,1984,(4)
[5]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中华书局,1988

参考文献

- [1]赵振铎.训诂学史略[M].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2]程湘青.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迟文浚,王玉华.尔雅音义通检[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4]徐朝华.尔雅今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5]郭璞.尔雅音图[M].北京:中国书店,1985
[6]郝懿行.尔雅义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朱骏声.说文通定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赵振铎.尔雅和尔雅诂林[J].古汉语研究,1984,(4)
[10]王磊.尔雅与郭注中词语的发展关系[J].西华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11]皮鸿鸣.汉语词汇双音化演变的性质和意义[J].古汉语研究,1992,(1)
[12]晁瑞.尔雅原文与郭注同语素双音节词语义研究[A].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C],2003

梁启超与清代学术研究

汉语言文学学院 韩中专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被钱穆先生称作是有清一代乃至明末至民初三百年学术的“殿军”，梁氏在上个世纪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关于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学术文化方面确立的历史功绩”，日本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狭间直树先生认为“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1](P93)}。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总结期中，梁氏以其广博而宏阔的涉猎，独到而精深的研究，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尤其是对有清一代学术的总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拟就梁氏研治清代学术的特色试作初步探讨。

一、求新求变、与时俱进的学术思想

梁启超早年随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治公羊三世之学，求新求变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特质。1890年梁氏于广东万木草堂谒见康有为，当时为其“孔子改制”的一番宏论所慑服。是年，梁启超从“导学者以汉学”的学海堂转入万木草堂学习，标志着他舍弃古文及训诂之学，皈依今文经学的开始。康有为作为今文经学派的集大成者，研治、宣扬公羊三世进化学说实际上是为变法改制、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找理论依据。作为康有为的忠实追随者，梁启超亲自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并承担撰写了《新学伪经考》中的《伪经传授表》上下及《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此后撰写《论语公羊相通论》已算得上是专门的今文经学著作。梁氏与当时友人夏曾佑切磋学问，竟至“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2](P76)}的如醉如痴的地步。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前前后后，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发起者与倡导者，是“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2](P75)}。

今文经学派的公羊进化之学一开始就奠定了梁氏求新求变的思想基础，又加上梁氏后来受到达尔文、斯宾塞思想的影响，历史进化论逐渐成为梁氏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变是“古今之公理”^{[3](vol1 P1)}，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而日趋于文明。因此，梁启超不仅对历史与文明发展持乐观态度，也把历史与文明进化视为基本的规律，提倡除旧布新，不断超越。

梁氏深刻地认识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在于西方人借古学复兴打破了传统权威，为新的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开辟了先河。“凡社会思想束缚于一途者既久，骤有人马冲其樊篱而陷之，其所发明者，不必其遂有当于真理也，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自能震悚一般人之

耳目,而导以一线光明,此怀疑派所以与学界革命常相缘也。”^{[4](P101)}梁氏认识到汉学的繁琐僵化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与学术的发展,要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学界的革命与发展,必须打破僵化与专制的局面,在求新求变中寻求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突破口与新出路。

日本石川浩桢先生在《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一文中指出:“回首19世纪,正可谓其为‘文明’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西洋各国满怀信心地把他们达到的水准称作‘文明’,并将其作为认识世界的普遍尺度。”他指出,不管接受与否,“文明”都是在19世纪后半期亚洲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世界体系,这些亚洲国家必须通过汇入这一文明体系而跨过通往近代世界的大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是在中西文明的激烈冲撞与碰触中进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中国的社会与学术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方面传统学术民族文化仍在社会伦理价值诸领域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在“茫茫欧风卷亚雨”的潮流中,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近半个世纪,野蛮的征服者在征服他所要征服的民族的同时更试图要征服他所征服民族的文明,中国当时的学术文化就是在这种拉锯战式的破坏与修补中重建。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中国从国门被迫打开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在吸纳西方文化,调整自己视角的态度中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后又标榜“自强”“求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尽管如此,他们的着眼点仍然是西方的器物文明,是仅仅从“船坚炮利”上“舍己从人”的民族自救的能动反应。随着甲午战争失败,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构想彻底毁灭。第二阶段的反思学习便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西方的强大更在于制度的精良,他们从洋务派的“西技”转向“西政”。然而单纯的政治制度学习与中国固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政治结构并不适应,学习西政的百日维新运动以昙花一现而告终。第三阶段便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终于更加深入地认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是绝对不可能的。中西文化的磨合撞击终于聚集到了思想精神层面,聚焦到了人与意识层面。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同样经历了类似的三个阶段。在国门打开之后的中国前所未遇到的新局面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积极思考学习,适时求新求变,展示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思想认识与视角的心路历程,而梁启超自身即为这种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这三个阶段是梁启超对中国吸纳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过程进行的概括总结和批判反思。正是以这种与时俱进的眼光,梁启超基于对新形势的正确把握,敏锐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重建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文化课题,也是一个民族命运攸关的政治课题,不仅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融通的课题,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实现新生的问题。只有适应时代的发展,找到媒介沟通中西,在学理层面上将西学纳入中学,中国学术的现代化才能得以完成。

与梁启超与时俱进,求新求变思想相紧密联系的是他的“新民”思想。1902年梁氏撰写传世名著《新民说》,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系统地阐述了新民的内涵与目标。《新民丛报》的创刊与“新民”思想的确立标志着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最早发起思想启蒙运动,并提出塑造中国新民的任务”^{[5](P12)}。在这里,“新民”找到了学术与现实的结合点。“新民”一词源自儒家《大学》,《大学》开篇即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亲民”为儒家的重要纲领之一,《大学》中对“亲民”的解释为:汤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梁氏发挥了其弃旧从新的方法论意义,将其改造为“新民”,并对“新民”的具体内涵作出了时代改造。梁氏在《新民说》中指出“新民”乃“自新之谓也”,新民的核心是“自新”,是主体通过各方面的陶冶调整自己,实现新生。他又从新的社会现实出发,特别是以西方新的思想文化作为精神内核对“新民”的具体内涵作了时代改造。梁氏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3](vol4 P1)}就其实质而言,“新民”更接近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精神。梁启超倡言求新,强调新道德应是公德而非“私德”。“新民”必须有新思想、新道德、新理想,有自尊进取的独立人格,有国家思想和权利义务思想,有政治能力和自治能力。新民说令人民尤其是青年学子耳目一新,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震动,产生了“重新固定一切价值”的思潮。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云:“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学问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的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4](P214)}梁启超以宏阔的视野与炽热的爱国热情敏锐地洞悉了“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深刻意义,唤醒了受约束的传统文化。以求新求变来实现传统学术文化的重新创构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特质。

二、实事求是、科学求实的治学精神

梁启超之所以取得清代学术研究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其求新求变的维新思想的坚持,更在于其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贯彻。不偏不倚,客观立论而无门户之见,以不虚美、不隐恶、对事不对人的治学精神来要求自己。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他能摒除门户之见,不断超越自我,广泛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与其师康有为相比,梁氏的研究较少地囿于门户之见,更能从客观的角度着手,持论公允。梁氏早年称“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对康氏的崇敬与感激无以复加,但他在早年随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时即“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批判其“好博好异而万事纯认主观”^{[2](P70)}的非科学的毛病。变法失败后梁氏在接受西学的基础上逐渐反思总结,而康有为由变法走向保皇,故步自封,导致师徒间矛盾尖锐。康有为与张勋复辟后,梁氏又举起反对帝制的旗帜,与其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时人的非议梁氏义正辞严地指出:“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亦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也。”“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3](Vol12 P59)}梁启超晚年通过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反思,一改年轻时的治学粗疏、流质善变,自言“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2](P78)}。治学态度上逐渐表现出一种认同、复归清学正统的倾向,务实求真,不做空言,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相当难得的。

在学术批评中,梁启超倡导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考证学派,梁氏首先肯定乾嘉学派的科学精神,同时对吴派和皖派的治学分别予以客观公允的评议,批评吴派过于迷信汉学,好排斥异己,因而“功过参半”,而皖派考证学派能尊重事实,明显优于吴派。他认为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以“尊闻好博”为能事,以“好古必真”定是非,虽确立了汉学的地位,但具有胶固盲从、排斥异己之弊。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考证以“深刻